**heritage/遗产(Yí Chǎn)**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WANG Qi | 30 May 2022 |

自1985年12月12日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并于次年开始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项目后，“遗产”在现代汉语中渐渐与“文化遗产”、“文化财产”、“文化资产”成为同义词，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开始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截止至2021年底，中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有56项，其中文化遗产38项，自然遗产14项，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4项。中国公众对“遗产”的兴趣日益浓厚。

“遗产”研究和保护事业在中国的确立与现代考古、尤其是公共考古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感受到了保护“遗产”的压力，近年来也同样感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潜在威胁。目前，学界把“遗产”分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大类，其中考古学家从事对“物质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如大遗址、历史遗迹、古代建筑遗存等；而“非物质遗产”中的习俗、节日等传统在民间自然流传，民间艺术、传统工艺则由民间艺人和手工艺人传承。

在作为专业领域的“遗产”概念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已形成了一种自觉的“遗产”意识，表现为在精神层面上与“过去”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其格律诗创作之上。中国人信古、崇古，这一点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像思乡、伤春悲秋、落花流水、独上高楼这些意象和情思的不断重复，几成陈词滥调，此现象甚至延续到当代汉语流行歌曲的创作之中。不可否认的是，意象和情思的重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塑造和传递无形精神遗产的有效手段，而格律诗自身的特点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律诗短小精练，写作者可以随时随地写景状物，捕捉心境，抒发胸臆。对读者来说，格律诗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加上人称主语在格律诗中缺席的情况居多，且较少在诗中提及具体的人和事——只在标题中出现，当然例外永远有，如李白的“我欲乘风归去”，“不及汪伦送我情”，因此读者能够轻易将自身代入诗境，形成强烈的共鸣。古人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游山玩水，留下不少以自然景观为对象的诗作，其精品力作经千百年流传，已逐渐与自然景观合而为一，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形的实物与无形的情思融合而成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位于中国东部的泰山因孟子尝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而为文人墨客心所向往，“诗圣”杜甫直接沿袭此典写成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更是广为流传，使得泰山这座海拔仅1500多米的山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说泰山的至上地位有孔子登临、历代皇帝封禅和杜甫佳句的助力，那么位于苏州城外的寒山寺的闻名遐迩，则完全因为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张继的一首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写于“安史之乱”，但诗人对此背景只字未提，只用白描手法写出了羁旅中人的孤寂和愁绪，结尾处又以寺院钟声的宁静祥和抚慰世间的漂泊者。从此，寒山寺从“南朝四百八十寺”中脱颖而出，几经兴废而香火旺盛；“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夜半钟声”这些字句也被刻入人心，吸引历代文人墨客在手书张继原诗的同时，在未脱离原诗意象的前提下创作了描写作者当下心境的新作。今天的寒山寺集宝刹、名诗、碑廊碑刻、宗教人士耳中带有禅宗顿悟意味的钟声为一身，这些承载着深沉的文化记忆的元素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自1979年开始，每年除夕夜聆听寒山寺钟声已成为寺院新年祈福的固定节目，虽然诗中那口唐钟早已不见踪影，而“闻钟声，烦恼轻”的佛教意味也渐与新年庆祝活动合一；就连寺外的“江村桥”也被认定为“枫桥”，实际上“枫桥”的位置无从查考。在寒山寺与《枫桥夜泊》之间，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之间，难分彼此，寺与诗、“物”与“事”共同构成了寒山寺的“实在”（reality）。这种“实在”不仅仅是实存意义上的“实在”，更是意念的、想象的、情感的“实在”，最终，寒山寺幻化为一个充满禅意的象征，一个跨越时空的情思层叠的符号，成为一个可以传诸久远的文化记忆和“遗产”。

寒山寺折射出的“实在”观与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有内在相通性。在面对“物”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有着历史渊源的“物”的时候，中国人并不是单纯地与“物”打交道，而是与因“物”而生的、环绕着“物”的文化打交道，包括语言、诗歌、神话、节庆仪式，“物”的实存与文化要素密不可分。以所有人都能观察到的日、月为例。对于太阳，古人关注的是日出日落的规律，因而有关日的诗句多是描述性的，如被庞德（Ezra Pound）引入其诗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描写日出时分的热烈色彩，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或者日落时分的庄严肃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相比之下，月相的变化在中国人眼中与人世的悲欢离合相关联，这一点在苏东坡作于中秋之夜的《水调歌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或许正因为如此，吟月的诗句多少有一丝清冷气息，像王维极具画面感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或李白表现孤独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象征圆满和团圆的圆月最能勾起羁旅之人对故乡故土的思念之情，在中国和日本妇孺皆知的李白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及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故土的眷恋，将思念之情投射到了更大的空间。可以预想，即便“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未来会被遗忘，但月亮作为思恋故乡故人的情感投射对象这一点却不会改变，关于月亮的千古绝唱已成为月亮的“实在”不可或缺的部分。

虽然通过语言和诗歌来塑造并传递文化记忆和“遗产”的方式十分有效，但这种做法亦使中国人对于实物本身的真实性不甚关心，只求“名正”，“名正”则“言顺”，并不刻意追求“名”“实”之间的一致。古人爱发思古之幽情。苏东坡1082年谪居湖北黄州时曾游览当地名胜赤鼻矶，并挥毫写下《赤壁怀古》。但实际上三国时周瑜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的发生地不在赤鼻矶，而在湖北蒲圻县西北，在长江的南岸，1998年该地正式更名为“赤壁”。苏东坡当知此赤鼻矶并非真正的赤壁，因为在大气磅礴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起兴句之后，苏东坡接着写到：“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注释家指出，苏东坡并非不知真实的赤壁何在，只是“以明俗记尔”。不管真相如何，没有身处赤壁大战的真实发生地的事实丝毫没有影响诗人的思古之情。诗人不仅写出了三国英雄人物风流潇洒的英姿——“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还深情地表达了自己身处古战场的感受——“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凸显了诗性想象力和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

这种重名不重实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古诗中出现过的不少亭台楼阁历经沧桑，已不可能修复，只能重建。修复需要用“绣花针功夫”，而重建则可以吸收同时代的审美观，同时保持名号不改。有着“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美誉的黄鹤楼约建于三国时期（公元223年），可考证的毁坏与重建多达30余次，历代诗人多有题咏，其中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已成千古绝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最后一次被毁是1884年，一百年后，在距旧址（1957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被占用）约1千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修建了一座5层、高51.4米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的仿木古建，古建比旧楼高近20米，巍峨挺拔，视野开阔。新建的黄鹤楼接续着层叠其上的文化记忆，游人络绎不绝，似乎无人追究此黄鹤楼是否是李白笔下的黄鹤楼。类似的例子还有江西九江的浔阳楼，它的闻名不仅因白居易《琵琶行》开首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狄花秋瑟瑟”，更因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主人公宋江、李逵曾在此地活动，因此浔阳楼重建时参考了《水浒传》画像本以及《清明上河图》，最终建成一座仿宋建筑，楼里还设有表现小说人物活动的壁画，把虚构故事当成了历史的“实在”。

对于中国人来说，上述有形遗产的“实在”由实物、语言和诗歌共筑而成，游览它们就是重访古诗词的意境，重拾古人的心境和情思，久而久之，中国式的意象和情感被固定下来，最终成为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所认同的无形精神遗产。这种“遗产”会代代传递。

参考文献：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王巍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ed. Colin Renfrew & Paul Bahn, Routledge, 2005.